

思念父亲张澜庆

○张廷宝



张澜庆学长

我的父亲张澜庆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可惜他英年早逝，年仅37岁。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三岁，因此我对他的记忆基本上是没有的。多年来，特别是我退休后有了闲暇，到父亲原单位即现国土资源部查档，寻找父亲的人生轨迹，搜集父亲同学朋友的回忆文章，整理父亲的笔记，才了解父亲的思想脉络，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也丰满起来。

父亲张澜庆，191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爷爷张毓英酷爱象棋，被尊称为“棋孟尝”，即中国象棋界的孟尝君。父亲是家中的老大，他有六个弟弟、三个妹妹，从小就是弟弟妹妹尊敬的大哥。中学时期，他带四个弟弟在同一房间就寝。这样的环境和经历，使他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会关心和照顾别人，遇事先人后己。

1928—1934年，父亲在扬州中学读书。扬州中学是江苏省名校，由于地域关系，大部分毕业生会报考南京和上海的大学。父亲中学时就通过报刊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对北京及清华大学很向往。为了动员同学和他一起报考清华大学，他事先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同学一一推介，动

员大家去考，发榜后，又动员他们一起北上。那一年，扬州中学有17人就读清华大学，是历年来最多的，其中有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亚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篔、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李为扬等。

父亲进入向往已久的清华园，开始在化学系，后转入地质系。我三叔张纯青曾回忆说，大哥暑期回家总带回一些进步书籍，有鲁迅、邹韬奋、茅盾、巴金等名家的著作，可见父亲在清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父亲的朋友吴征镒在回忆录中记载，父亲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因学校放假，父亲正在扬州家中。他带着弟妹妹们到照相馆拍了两张“十兄妹”合影，此后，十兄妹再也没有团聚。

9月，清华、北大、南开迁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和两个同学从扬州乘车到镇江，搭乘客轮去汉口，再到长沙，在韭菜园附近租屋居住。11月的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父亲和两个同学正在天心阁一带散步，在日机轰炸声中，他们沿墙冒险跑回住处。路过车站附近，他们看见几具被炸老百姓尸体，特别是看到有人双手捧着被炸断了一条腿的幼儿在路上狂奔，其情景惨不忍睹。他们亲见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当年12月，父亲离开学校，进入位于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茂林对叶挺率领的新四军实行包围袭击，经七昼夜血战，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当时在江西上饶某军事部门从事绘图、看电文等工作，他得悉国民党反共的血腥事实后，愤然离开工作岗位，7月上饶到桂林，再转贵阳。同年9月，回到西南联大复学。

复学后，父亲对这个机会备加珍惜，学习更加刻苦努力。194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并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地质研究所研究生，主修岩石学（后因故休学两年）。他和同学王大纯、黄振威合著的论文《安宁盆地地质矿产》获中国地质学会1944年奖金。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唆使大批武装军人及便衣涌至联大、云大等校，并冲破联大校门，在校舍内开枪掷弹，极尽屠杀之能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伤者数十人。

12月6日，西南联大等数十所大中学校教师发表《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已经是联大教师的父亲也积极参与了罢教宣言的签名。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次活动——四烈士的大出殡。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西南联大的讲、助、教阶层组织了一台路祭，特意安排在华山南路国民党省党部的门口。据吴征镒先生回忆，我父亲和很多平常不大露面但是思想倾向进步、有正义感的教师都

参加了。灵柩一露面，路祭就开始了，由陈光远司仪，吴征镒主祭宣读祭文。吴征镒说：“‘一二·一’运动前后，他（张澜庆）的思想转变了。”父亲在干部履历表里是这样写的：1945年12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吴征镒。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父亲始终头脑清醒且冷静。1945年底的一天，父亲的好友韩德馨（南菁中学教师，“一二·一”烈士于再的同事）从校外归来，传达室工友告诉他，近日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校门口想方设法找他，劝他务必小心。我父亲得知此事后搬来南菁中学，接替了韩德馨所开课程，安排他先搬往城里五华中学，并力劝他前往已考取的中航公司报到培训，放弃第二年复员回北平的想法，以防意外。在紧张应对间隙，父亲嘱咐他注意安全、冷静应对。父亲的情谊和真诚，给韩德馨带来温暖和力量。使危险之中的他，得以有条不紊地安全脱身。多年之后回忆此事，他仍难忘磨难中的同学友情。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回家途中即遭暗杀。据吴征镒回忆，8月初，他、郑尧和我父亲等最后撤退的联大师生，在离昆明之前，为闻一多师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吴征镒不得已用特务不懂、比较隐晦的文言律诗写了五章《哭浞水闻一多师》。父亲在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写的：“1946年李闻血案后在昆明担任联络小组长。”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告结束，父亲随学校返回北平。据吴征镒回忆，他和机械系的杨捷发起重新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不少助教讲师参加，我父亲是读书会

□ 怀念师友

的积极分子，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

1947年9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地质研究所复学，攻读矿床学，导师是袁复礼教授。1948年7月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湖南临武县境内钨锡矿之地质研究》，成绩76分。

1948年初，父亲和母亲结婚，证婚人是袁复礼教授。婚后，他们住在吴征镒的清华北院半套教授宿舍里。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家里开会，母亲为他们望风。他们的桌上总是放一副牌，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几个人就开始打牌。

1948年5月，李建武、王志诚和父亲组织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主要成员为教职员，人数约20多人，是清华大学“南系”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之一。1948年12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以及参加过国军，入党以后，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曾在笔记本上写道：“不能全部生活入党，我最大毛病。”

1949年6月的一天，父亲对母亲说：“明天在二校门公布党员名单。”母亲问：“你是党员吗？”父亲说：“你自己去看吧。”虽然心中有数，第二天母亲还是到二校门去看了党员名单。

1949年开国大典，父亲不但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而且担任了旗手（他身高1米88），回到家他很兴奋地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校旗，高呼“清华同志们万岁”。

1951年，父亲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工作，任计划处副处长兼李四光先生的秘书，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地质系教一门课

“工程地质学”。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祖国地下宝藏的新发现——两年来地质工作在探矿方面的成就》。在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的先锋”“是制订经济建设计划时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祖国的建设，今后需要更大的努力”。

父亲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刚结婚时，母亲问他：“你不吃什么？”父亲告诉她：“带毛的不吃掸子，带腿的不吃板凳。”意思是说家里做饭不用考虑他，他什么都吃。父亲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不多，只要他在家，总对母亲说：“你身体不好，事情我来做。”吃饭时，有好吃的总是让家人先吃。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父亲的健康。入党以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生病前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又一次透支。母亲总说：“没想到那么高的一个人，说倒就倒了。”

1951年，我三叔张纯青（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来北京开会，考虑到朝鲜战场的浴血奋战，他和大哥（我父亲）、三妹（我的姑姑张美庆，正在北京读书）到照相馆拍照，母亲带着不满两岁的我也去了。没想到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2年5月，因脊椎结核宿疾转为结核性脑膜炎，父亲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住进人民医院。8月5日晚上8点，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他的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很重视，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将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碑文中对父亲做了如下评价：“对革命工作，一贯积极，不畏辛劳，对



张澜庆学长与家人珍贵留影。
左起，后排：张澜庆、张纯青，前排：张澜庆爱人刘若珠，张延宝，张美庆。

党忠诚，作风正派。”父亲的优秀品质，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母亲和父亲感情很深，她把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终点。她一直记得1950年她生病住院时，父亲去医院看望，并告诉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事，母亲问：“你报名了吗？”父亲反问：“你说呢？”母亲说：“你这么积极的人，一定报名了。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出意外，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父亲说：“我想过了，现在是新社会，你一定能把孩子带大的。”父亲走后，母亲陪伴我们整整39年，她看到我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看到他们的第三代。

因为父亲去世时我们太小了，母亲把父亲看过的书、笔记、卡片，他穿过的衣服等，一直收藏着，无论房子大小，这些物品都保留着，夏天还要拿到太阳下晒。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对爸爸的认识，是从墙上的遗像和他的遗物开始，当然，还有到八宝山扫墓。父亲去世一周年时，母亲和姑姑带我和大妹妹延安去八宝山，我还不能明白扫墓的含义，只记得妈妈和姑姑撕心裂肺的痛哭。

每年换季时，母亲打开衣箱找衣服，

我们都要求“看宝石”，那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三颗水晶，一颗淡紫色，一颗天蓝色，一颗浅绿色。他对妈妈说：“我有三个女儿，这三颗水晶是留给她们结婚时做戒指的。”长大以后，我才理解这深如海、重如山的父爱。虽然父亲陪伴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是三个女儿都是他的掌上明珠。父亲去世时，我的小小妹妹才8个月，现在回想，也许当年父亲预感到他不能看到我们长大，在短暂的几个月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1959年夏天，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秘书找到我母亲，对她说：“李副院长让你带三个孩子到他家去，他想看看她们。”母亲不想打扰日理万机的李副院长，就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们三姊妹的照片，照片是请邻居拍的，虽然是暑假，妈妈特意让我戴上了红领巾。10月份，秘书带来了李副院长的回信，这封信给我母亲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何成钧伯伯是父亲的挚友，因为历史原因，他“回避”了我们十多年。1973年的一天，他辗转打听找到我们在科学院第二宿舍的家。妈妈很为他的深情厚谊所感动。2007年1月，何伯伯去世后，我给他的夫人张阿姨的信里这样写道：“虽然父



张澜庆学长的三个女儿。
左起：二女张延安、长女张延宝、三女张延宏。

□ 怀念师友

亲没有看到我们长大，但是五十多年来，何伯伯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们。”现在，我和何伯伯的女儿还有联系，这是七十多年的情谊。

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少与外界联系。1988年，我母亲意外地收到两本《清华十级纪念刊》，里面有父亲在大学时的照片，有同学对他的回忆，还有一段父亲的简历。这份简历十分准确，我母亲和我们三姐妹的名字、工作单位，一个字也没错。我们猜测这是何成钧伯伯提供的，只有他最清楚我家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家每年都能收到《十级校友通讯》。2006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我自愿去为十级同学聚会服务。主持人陈宝仁伯伯向大家介绍“这是张澜庆的

女儿”时，一位阿姨大声说：“张澜庆是我们班的。”她是化学系的，我父亲入学在化学系，后来转到地质系，72年过去了，阿姨还记得我父亲，我很感动。

1992年，我因工作关系去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亚杰先生家。讲话时，我觉得他的口音比较熟悉，就问他是哪里人？并告诉他我父亲是扬州人，1934年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他当即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当我说出“张澜庆”三个字时，他很激动，对在另一个房间的杨岫云阿姨大声喊：“杨岫云，我找到张澜庆的家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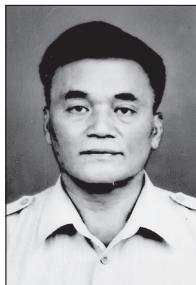
从1952年到2022年，父亲离开我们70年了。他没有走远，他的形象活在我们心里，他的不畏辛劳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不朽的张兴华

○鲁一夫

2022年7月2日，我的一个在合肥的战友沉痛地向我通报“张兴华教授走了”。仔细地看了一遍讣告，泪目中，蓦地，六年前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1946年出生的四川自贡人张兴华比我大11岁，绝对是老大哥，但当兵却比我晚了几年。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合肥，他可是个人物，名气大得很。1970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1979年3月入伍参加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筹建，1985年1月入党，大校军衔。2006年9月从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信息对抗系微波教研室教授岗位上退休。为中共合肥市军休一所第四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合肥市关



张兴华大校遗像

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报告团宣讲团成员之一。

退休后，张兴华教授一直潜心抗战文物收藏、抗战历史研究，义务为群众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2013年，在自己家中建成“抗日文物陈列室”，开展展